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 ·漫说文化

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 著

北京大学出版社
北 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·漫说文化 / 钱理群, 黄子平, 陈平原
著. - 北京: 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0.11
ISBN 7-301-02515-0

I ①二...②漫... II ①钱...②黄...③陈... III ①文学研
究—中国—现代—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 ①I267.5②I26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0) 第 000000 号

书 名: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·漫说文化

著作责任者: 钱理群 黄子平 陈平原 著

责任编辑: 艾 英

标准书号: ISBN 7-301-02515-0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邮编 100871

网 址: 北京大学出版社网站 <http://www.pup.cn> 电子信箱: zhaoyan@pup.cn

电 话: 邮购部 010-62750175 发行部 010-62750176 编辑部 010-62750177

排 版 者: 北京军峰公司

印 刷 者: 北京大学印刷厂

经 销 者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×1092mm 1/32 印 张: 10.5 字 数: 250千字

2000年 11月第 1版 2000年 11月第 1次印刷

定 价: 15.0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, 翻版必究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

陈平原

中国学界之选择“文学史”而不是“文苑传”或“诗文评”，作为文学研究的主要体式，明显得益于西学东渐大潮。从文学观念的转变、文类位置的偏移，到教育体制的改革与课程设置的更新，“文学史”逐渐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知识体系。作为一种兼及教育与研究的著述形式，“文学史”在 20 世纪的中国，产量之高，传播之广，蔚为奇观。

从晚清学制改革到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展开，提倡新知与整理国故终于齐头并进，文学史研究也因而得到迅速发展。在此过程中，北大课堂曾走出不少名著：林传甲的《中国文学史》（1909）还只是首开记录，接踵而来者更见精彩，如姚永朴的《文学研究法》、刘师培的《中国中古文学史》和《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》、黄侃的《文心雕龙札记》、吴梅的《词余讲义》（后改为《曲学通论》）、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胡适的《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》和《白话文学史》、周作人的《欧洲文学史》和《中国新文学的源流》，以及俞平伯的《红楼梦辨》、游国恩的《楚辞概论》等。这些著作，思路不一，体式各异，却共同支撑起创立期的文学史大厦。

强调早年北大学人的贡献，并无“惟我独尊”的妄想，更不会将眼下这套丛书的作者局限在区区燕园；作为一种开放且持久的学术探求，本丛书希望容纳国内外学者各具特色的著述。就像北大学者有责任继续先贤遗志，不断冲击新的学术高度一样，北大出版社也有义务在文学史研究等诸领域，为北大向世界一

流大学迈进呐喊助阵。

在很长时间里,人们习惯于将“文学史研究”理解为配合课堂讲授而编撰教材(或教材式的“文学通史”),其实,“海阔凭鱼跃,天高任鸟飞”,此乃学者挥洒学识与才情的大好舞台,尽可不必画地为牢。上述草创期的文学史著,虽多与课堂讲授有关,也都各具面目,并无日后千人一腔的通病。

那是一个“开天辟地”的时代,固然也有其盲点与失误,但生气淋漓,至今令人神往。鲁迅撰《中国小说史略》序言,劈头就是:“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”,后世学者恰如其分地添上一句:“有之,自鲁迅先生始。”当初的处女地,如今已“人满为患”,可是是否真的没有继续拓展的可能性?胡适撰《国学季刊》发刊宣言,以历史眼光、系统整理、比较研究作为整理国故的方法论,希望兼及材料的发现与理论的更新。今日中国学界,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,早就超越胡适的“三原则”,又焉知不能开辟出新天地?

当初鲁迅、胡适等新文化人“整理国故”时之所以慷慨激昂,乃意识到新的学术时代来临。今日中国,能否有此迹象,不敢过于自信,但“新世纪”的诱惑依然存在。单看近年学界之热心于总结百年学术兴衰,不难明白其抱负与期待。

在 圆世纪的最后一年推出这套丛书,与其说是为了总结过去,不如说是为了面向未来。在 圆世纪中国,相对于传统文论,“文学史”曾经代表着新的学术范式。面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,文学史研究究竟该向何处去,如何洗心革面、奋发有为,值得认真反省。

反省之后呢?当然是必不可少的重建——我们期待着学界同仁的积极参与。

圆世纪 圆月 愿日于西三旗

小 引

陈平原

这里合刊的 ,是两册有趣的小书。

说“小书” ,很容易理解。相对于时贤动辄四五十万字的大著 ,这不到十万字的篇幅 ,实在够寒碜。不敢打肿脸充胖子 ,说什么以一当十 ,言简意赅。小书就是小书 ,不必讳言。只不过西哲有云 :“大狗叫 ,小狗也得叫。”我想补充一句 :叫得欢的小狗 ,其憨态也自有可观及可爱处。如此不太恰当的比喻 ,用在我们当初的“表演” ,还是挺贴切的。

这就说到“有趣”了。面对这两册小书 ,最可能感叹“有趣”的 ,很可能不是热心的读者 ,而是作者本人。从 员愿年到 员怨国年 ,我和钱理群、黄子平三人 ,在区区燕园里 ,“热火朝天”地切磋学问 ,先是纵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 ,后又“漫说文化” 。而这两次合作(加上“未完成”的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) ,多少都引起了学界的关注。学术上的创获到底有多大 ,不好说 ,倒是那种合力奋进的精神状态 ,很是感人。或许 ,这就是人们常说的“八十年代学术”的特征 :虽则粗疏 ,但生气淋漓。

到了为出版《漫说文化》(长沙 :湖南教育出版社 ,员怨怨苑年)而分头撰写《岁月无情又多情》、《漫说“漫说……”》和《十年一觉》时 ,已颇有“白头宫女说玄宗”的意味。其实 ,不过几年光景 ,可物换星移 ,再也没有了当初的豪气、志气与稚气。

将“志气”与“稚气”相提并论 ,并非玩弄文字游戏。正因为所知有限 ,方才果敢决绝 ,认准了 ,就一直往前走。若等到饱读

诗书、阅尽沧桑,那时很可能反而四顾茫然。在这个意义上,愿年代的我们,年纪虽不小,但依然“童言无忌”,也自有可爱处。

翻阅此类“开风气”的小书,在作者是追忆时光流逝,在读者则可以一窥学术之演进。近些年,不断有学界新秀反省我们当初的“反省”,引申、证实或质疑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这一命题。顺带的,也就对这一概念产生的契机、背景、动力以及效应等感兴趣。于是,常有人通过各种途径打探这册书,愿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的《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》,也不时有出版社的朋友建议重印此书,但都被我们婉言谢绝。理由很简单:未能更上一层楼,贸然重做冯妇,愧对江东父老。

直到有一天,读到某君大作,将《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》的发表作为“历史事件”来考察,这才猛然醒悟——那文、那书,早已进入历史,既没必要修订,也不可能完善。念及此,有点悲伤,可也仿佛卸下了千斤重担。

想想也是,不就因历史的偶然,侥幸留下几行蹒跚学步的足迹?既然随时都可能被重新卷起的海浪冲刷得一干二净,又有什么可矜持的?就这个样子,不做进一步阐释,也不纠正当初的失误,让其素面朝天,更能显示此书的“历史价值”。惟一需要补充的,是当初因某种特殊原因而被撤下的《关于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的两次座谈》。

蓦然回首,最令人感怀的,其实不是什么是非与功过,而是促成那几回“三人行”的思想潮流、社会氛围,以及自以为颇具创意的对话文体。

圆年 源月 圆日于京北西三旗

目 录

“文学史研究丛书”总序	陈平原(员)
小引	陈平原(员)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

写在前面	(猿)
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	(猿)
关于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的对话	(猿)
缘起	(猿)
世界眼光	(源)
民族意识	(源)
文化角度	(缘)
艺术思维	(苑)
方法	(愿)
附录一 关于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的两次座谈	(怨)
附录二 关于“表现即艺术”的讨论	(员怨)
附录三 有关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种种反响的综述	(员圆)
后记	(员圆)

漫 说 文 化

漫说“漫说文化”(代序).....	陈平原(员圆)
岁月无情又多情.....	钱理群(员圆)
十年一觉.....	陈平原(员圆)
漫说“漫说.....”.....	黄子平(员圆)
“说东道西”的姿态.....	钱理群(员圆)
漫卷诗书喜欲狂.....	陈平原(员圆)
“父父子子”里的文化.....	钱理群(员圆)
兼问苍生与鬼神.....	陈平原(员圆)
“乡风市声”的意味.....	钱理群(员圆)
未知死 焉知生.....	陈平原(员圆)
“世故人情”中的智慧.....	钱理群(员圆)
男男女女的主题.....	黄子平(员圆)
难得浮生半日闲.....	陈平原(员圆)
何必青灯古佛旁.....	陈平原(员圆)

國學源 年 月 潮州行 , 三人品茗聊天 ,
逸兴遄飞。



1985年初春

黄子平即将去国远游,在老钱家
为其送行时摄。



1995年 9月 去国多年的黄子平回北大讲演，
重提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。

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1980年 员月 参加在汕头大学举行的国际
会议 ,三人再聚首。



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

写在前面

—

当我们三个人就各自研究课题中碰到的一些疑点在一起“神聊”的时候,并未意识到会有一个新的“文学史概念”逐渐萌生出来。这个概念的某些轮廓一旦从思想迷雾中浮现出来,我们都不禁为之兴奋不已。好些久思不解的问题,似乎突然被置于一个新的理论架构中获得了解释——仿佛一道闪电把某些事实、事实之间的联系、评价事实的方式等等都照亮了。同时我们也体验到了对话,作为一种人际交流的方式,同时也是一种文学批评的方式,一种使思想增殖的方式。

思想从来都不是一种自言自语——智慧的火花只有在撞击中才会迸放出来。古往今来,不知有多少新鲜的见解、大胆的设计以至神妙的隽语,是在对话中产生的。书信往来,文章商榷,都不若直接的对话来得带劲儿。在直接的对话中,你领略到思考的乐趣、口语的魅力和一种“现场气氛”。对话者常常会因冷不丁蹦出的几句隽语或“打通”了某个难题的关节而激动起来。这里没有任何防御的堡垒,对话者乐于“赤膊上阵”,紧张地开动脑筋,应付各种突如其来的提问,捕捉种种转瞬即逝的思绪。学术性或半学术性的对话一点也不轻松,尽管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。“柳暗花明”时固然欣喜欲狂,“山重水复”处更有魅力。论证、说明、释疑、反驳,在对话中悄悄地拓展自己的理论设想。是

围绕学术问题的讨论,更是一次智力游戏和精神散步。

当然,既不同于“砍大山”式的海阔天空,不着边际,也不同于学术报告会的正襟危坐,不苟言笑。围绕一个共同感兴趣的议题,无拘无束地聊起来。有引经据典,直接从书架上取下书来翻开念上一大段的时候;也有节外生枝,近乎插科打诨的地方。对话中,不但要学会做一个“言者”,更要学会做一个“听者”。在中国,历来很重视“听的艺术”,孔子说“六十而耳顺”,庄子说“勿听之以耳,听之以心,勿听之以心,听之以气”,而繁体字的“聖”字,正是从耳从口。然而,相当长的时间里,这“听的艺术”似乎被我们弃置不顾了——人人都抓住你滔滔不绝地灌输,灌输是不需要这种认真、主动、积极的“听”的,那么人们也就学会了“这只耳朵进,那只耳朵出”。显然,光会说不会听的对话不是真正有水平的对话,在这里,“开放的心态”、“精神互补”、“真理面前人人平等”等等,比什么都重要。

中国古代文人据说曾经“清谈误国”,然而从那种品评诗文、月旦人物的方式之中,也不是没有一点可取之处。有时直截了当,寸铁杀人;有时举重若轻,画龙点睛。有风度、有情韵,仿佛千载之下,仍能想见当时的倜傥潇洒、挥斥方遒。唇枪舌剑也好,睿智幽默也好,对话必须成为一门“艺术”。聊天容易,真正聊得有“神”,就很难。我们常常觉得在“神聊”中,“神”比“聊”本身还要重要。尽管聊的是学术,也仍然可能“神采飞扬”。

虽不能至,心向往之。

二

把学术聊天的内容录下来,整理成文字发表,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,但也可能隐伏着某种“危险”。即使不考虑面对着录音机话筒时的聊天毕竟跟平时的聊天有所不同,也还有一些原先未曾料到的因素值得考虑。

彼此过于熟悉的对话者,在共同话题的多次讨论中,可能形成某些旁人无法理解的“惯用语”或“行话”,常常某些要紧处只须寥寥数语就能互相心领神会,照录之后却可能令读者觉得前言不搭后语,不知所云。许多彼此都熟知的背景材料在对话中往往一笔带过,对读者来说却必须交代清楚。那些离开了具体语境、失却了音调变化及与表情、手势协调的口语一旦变成文字,也常常显得过于“朴素”,显得索然无味。

古人清谈,谈上十天八天,就留下那么三句五句,当然显得“精粹”。如今倘以“学术水平”来要求我们的对话,又要言之成理,言必有据,逻辑性强,又要求保持“神聊”的“神”,这就非常困难。整理时不得不使对话略为“紧凑”,不得不删去一些颇为得意的“题外话”,不得不在本来心领神会无须点破处^略。嗦几句——经过这么一番整容,发表出来的对话录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真正的“对话”了。尽管如此,我们也还是希望这类“拟对话”比一般文章更能表现人的思维过程,因而为读者们所接受。

理想的学术对话录应既有论文的深邃,又有散文的洒脱。读者在了解对话者的思想时,又可领略对话的艺术。关键在于整理成文这一后期制作的工夫,而在于对话本身是否“言之有物”。我们渴望见到更多的未加过分整理的“学术对话录”的问世,使一些述而不作者的研究成果社会化,使一些“创造性的碎片”得以脱颖而出,并形成一种在对话中善于完善、修正、更新自己的理论构想的风气。

中国古代的“问难体”(《答客诘》之类),只是借攻击假设敌来论证自己的观点,设置障碍是为了显示论者跨越障碍时的高超,为了展现跨越之后那种快意的驰骋。现代也有一些名人谈话录或你问我答的名人专访,提问者往往以秘书、弟子的谦恭身份出现,不是真正平等的对话。我们现在各类学术讨论会频繁举行,即便讨论极为生动活跃,充满了风趣横生的插话、补充、反话,整理出来的记录却又死气沉沉,仿佛是一篇学术论文分给了

各位与会者每人念一段似的。

如今风行“纪实文学”、“报告小说”和“口述实录文学”，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之中，是否可以尝试一下“口述实录评论”呢？

三

并不单是由于这种方式的亲切、平易近人、随意、自然、放松。这当然是很重要的。读者看腻了架子端得十足的高头讲章或指着鼻子教训人的“大批判”之后，他们很希望参加进来与思考者一起平等地对话。这也是我们把《论“二十世纪中国文学”》这篇学术论文付诸发表之后，想到要把我们讨论论文时的一些录音整理出来的一个根本原因。我们甚至希望不是搞文学史的普通读者，也能对这个概念涉及的一些问题发生兴趣。实际上，我们异常珍视那些来自专业之外的建议、批评和质疑。北京大学学生会博士生部曾经召开过一次小型的座谈会，讨论我们的这个概念。人们从经济学、历史学、哲学甚至自然科学的角度，提出了我们意想不到的许多问题，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“思维材料”，扩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。在别的一些场合，来自专业以外的意见总是使我们大受启发，获益匪浅。

显然，更重要的是，对话揭示了一种思考的“过程”，一种由不成熟通向成熟又通向新的不成熟的过程。我们从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，提出来的仅仅是关于文学史研究中一个特定课题的理论构想。把“现成结论”一端出来就想强加于人，就试图“罢黜百家，定于一尊”，我们多年来也受够了这类苦头了。钻研的过程、探讨的过程，可能比已经达到的结论更有价值。那些零星的、即兴的、一闪而过的想法，就算是不成型的碎砖吧，也许就能引发出真正有价值的“玉”来。我们也知道，“胸有成竹”、“烂熟于心”、“一挥而就”，可能更显得自信、有气派、有分量、有爆发力。我们却更愿意把不成系统的被人轻蔑地视为“鸡零狗碎”